

中国发展道路丛书·政治卷

当代中国政治

基础与发展

林尚立 著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发展道路丛书·政治卷

当代中国政治

基础与发展

林尚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 / 林尚立著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11
(中国发展道路丛书·政治卷)

ISBN 978-7-5000-9979-6

I. ①当… II. ①林… III. ①政治—研究—中国
IV. ①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1492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郭银星

封面设计 程 然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093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20 千字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9979-6

定 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引论：从中国把握中国政治 / 1

- 一、现代政治文明出发点 / 1
- 二、中国现代政治的生成 / 6
- 三、中国国家转型的逻辑 / 12
- 四、中国政治发展的持续性 / 16

第一篇 根基

第一章 大一统与中国政治 / 23

- 一、大一统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形态 / 24
- 二、大一统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 / 34
- 三、大一统政治的生命历程及其遗产 / 40

第二章 共和制与国家转型 / 51

- 一、大一统中国选择民主共和 / 52
- 二、国家在共和民主中整体转型 / 58

三、政党与共和民主国家相生相伴 / 62

四、共和民主根本在人民作主 / 68

第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与共产党 / 73

一、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观 / 74

二、社会主义共和国 / 79

三、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 / 87

四、中国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 96

第二篇 领导

第四章 党领导中国 / 105

一、共产党对现代中国的意义 / 106

二、共产党建设现代国家 / 110

三、大党与大国 / 115

四、革命党与执政党 / 119

五、执政党与政党制度 / 127

第五章 党与社会 / 132

一、中国需要先锋队 / 132

二、先锋队的属性 / 137

三、党的使命与能力 / 142

四、政党的行动原则 / 145

第六章 党与国家 / 150

一、领导国家前途 / 151

二、工人阶级领导 / 155

三、统一战线 / 160

四、领导制度 / 163

五、建构国家 / 167

第七章 党与军队 / 171

一、中心支柱 / 172

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176

三、党指挥枪 / 180

四、人民的军队与国家的军队 / 185

五、政治工作体系 / 189

第三篇 治理

第八章 宪法与法治 / 197

一、宪法与革命 / 197

二、宪法与国家 / 202

三、宪法与民主 / 206

四、宪法的政治原则 / 211

五、宪法与法治 / 215

第九章 制度与发展 / 220

一、自主建构制度 / 221

二、制度精神的统一 / 225

三、变革中求发展 / 228

四、合法性与有效性 / 235

第十章 组织与治理 / 240

一、党的基层组织 / 241

二、党派与政协 / 246

三、社会组织 / 251

四、企事业单位 / 256

第十一章 文化与价值 / 262

- 一、文化国家与国家文化 / 263
- 二、主义、意识形态与价值 / 268
- 三、认识论与民族精神 / 275
- 四、思想教育与公民塑造 / 282
- 五、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 / 287

第四篇 发展

第十二章 政治建设 / 295

- 一、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 / 296
- 二、政治建设的权力空间 / 299
- 三、党的建设与政治建设 / 304
- 四、人民民主的巩固 / 309

第十三章 人民民主 / 315

- 一、民主发展的双重逻辑 / 316
- 二、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 / 320
- 三、国家发展民主能力 / 325
- 四、复合民主中的人民民主 / 329

第十四章 权力监督 / 336

- 一、预防权力腐败 / 337
- 二、监督权力运行 / 342
- 三、体系化权力监督 / 346
- 四、人民群众监督 / 349

第十五章 协商民主 / 355

- 一、协商民主与民主共和 / 356

二、协商民主与党的领导 / 360

三、协商民主与国家整合 / 364

四、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 / 367

第十六章 国家治理 / 372

一、国家治理的制度 / 373

二、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 378

三、国家治理促国家制度成长 / 385

引论： 从中国把握中国政治

中国是一个拥有很长政治文明史的国家。迄今为止，它创造的政治形态大致有两种：一是古典的；二是现代的。古典政治形态，土生土长，创造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绵延二千余年；同时，构筑了华夷秩序，创造了东亚文明圈。现代政治形态，源于西方，中国在经历了实验和探索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综合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现代政治。这是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形态，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唯一的联系是从古至今没有解体的中国社会。于是，面对现代中国政治，世人常常产生这样的困惑：中国现代政治，到底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是应该按照西方的逻辑走，还是按照中国的逻辑走？这种困惑使得人们无法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国现代政治及其未来的前途和方向。本书力图给出的答案是：应该从中国出发把握中国政治。

一、现代政治文明出发点

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史，人们常常用由“民主”与“独裁”组成的

一双眼睛来观察和透视，并由此来简单判定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东方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差别。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的分析和判断来看，源于西方的民主化已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流。面对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今天，千百万以前曾在独裁专制统治者下受苦受难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于历史上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地带也得到了大大的扩展，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① 对于这样政治变迁的未来命运，亨廷顿给出了十分自信的回答：“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② “在正在兴起的经济发展的浪潮的推动下，每一波浪潮都比前一波进得更多，退得更少。套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导人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的确会前进。”^③ 在此，亨廷顿以非直接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民主最终一定战胜独裁，西方文明的民主一定会成为世界普遍的政治形式。然而，民主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亨廷顿坚定的信念，一半是对的，另一半则是错的。民主最终一定能够战胜独裁，但战胜独裁的民主，并不都是“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从实践来看，西方国家二战后所致力民主输出实践，许多时候传播的是西方的民主理念与制度，种下的却是分裂、冲突与战争的种子，使无数的百姓不得不承受民主所带来的民不聊生的代价；从理论上，民主是最先出现在西方，但其本质却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言第3页。

② 同上，序言第5页。

③ 同上，第380页。

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必然，西方只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第一个表现形式，但绝不是唯一的形式。民主在不同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所蕴含的普遍性，不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普遍性，而是民主所体现的人类自我解放的普遍性。

有一个事实是谁都否定不了的，即民主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志，自然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体现。至于为什么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理论和答案有多种多样，相对而言，马克思的回答更为深刻和科学，因为它从人类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的。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其拥有意识，而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人所拥有的动物性欲望上升为追求自由的生命意志，这种生命意志决定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即人不断摆脱自然与他人（社会）所带来的束缚的过程。在人尚未有充分的能力摆脱其中任何束缚的时候，人为了生存，都依附于一定的共同体，其现实存在是作为共同体成员而存在。人的这种存在塑造了人类的古代历史。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个体独立生存能力的不断增强，人就逐渐摆脱了对特定共同体的依赖，获得了独立自主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这是人自我解放的一大飞跃，是人的类本质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开辟了现代历史，形成了现代社会，建构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随着个体独立所带来的私人生活的抽象，国家也就从社会中抽象出来，与社会形成二元结构关系。现代政治制度就是二元存在的国家与社会相互适应的产物，以个体为单位组成的现代社会决定了现代政治制度形态选择必然是民主的。^①

西方思想家往往都是从个体独立及其所决定的市民社会来解释现代民主的由来与必然性的，但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更加彻底，因

^① 参见林尚立：《建构民主——中国的理论、战略与议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本书第一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相关思想和理论。

为，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肯定个体独立与现代社会是现代民主的基础，而将民主的内在必然性确立其上。马克思认为，人类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借助这第三种力量来解决自身的矛盾与冲突，因而，从根本上讲不希望作为人类的作品的国家异化为奴役人类的力量。这决定了人类在创立国家的时候，就天然地要解决人对国家的驾驭与控制，从而使国家真正掌握在其创立者，即人民手中。由此，马克思认为，国家制度是人的自由产物，这才是国家制度的本来面目。既然如此，体现和保障人的自由的民主制度，就不是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形式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存在的。这样，在马克思理论中，“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① 存在于各国的国家制度，本质上都不过是民主制度在具体国家的具体体现，即使是君主制，其本质也都不过是民主制度缺失而产生的一种变种。“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必然是本身不彻底的民主制，而君主环节却不是作为民主制的不彻底性而存在着。”^② 基于此，马克思的结论是：“一切国家形式在民主制中都有自己的真理，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有几分不同于民主制，就有几分不是真理，这是一目了然的。”^③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政治文明的出现是人类自我解放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换言之，只要人的自我解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将作为一切国家制度真理的民主制呈现为现实的制度形态。因而，现代民主制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出现，并不是西方文明创立的民主制度，而是西方社会相对超前的变化与发展，使民主制度首先在西方社会被呈现出来。

然而，西方在民主上的历史首创性，很快就扭曲了民主制与人类文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282页。

明之间的关系，因为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普遍地要利用这种历史首创性，将西方创造的民主制度变成为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普遍模式，其具体手段是将西方民主制度内含的价值和原则抽象为人类的普遍理性，使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政治的精神与原则。在这种抽象中，不仅人从具体的人变成了抽象的人，而且使所有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文化都从具体的存在变成为抽象的存在。于是，现实的政治实践，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如何将带有先验性的西方政治精神与原则标准化地注入具体的国家与社会，改造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些西方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将西方的民主视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①于是，基于人类本质属性而发展出来的现代政治文明被彻底模式化为西方的政治文明，在这其中，其他国家与社会自然也就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与发言权，只能等待西方民主浪潮的洗礼。亨廷顿的“第三波”概念就包含着这层意思。

民主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这绝对不等于民主在现代文明中的发展是一种模式化的发展。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国家依然是现代文明建构与发展的基本单位，而国家及其所对应的社会是具体的，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有自己的发展方位与议程。然而，这很简单的道理并没有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中得到充分的尊重与遵守，不仅代表西方文明的西方社会是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具体的实践中也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失去自我，依附在西方的模式之下。于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不仅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直接表达，而且成为各国现代政治建设与运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基本尺度。西方社会将这种局面视为理所当然，并为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此骄傲自豪；然而，现代政治文明却因此而危机不断，因为，民主的模式化似乎加速了民主的推广，但却往往成为直接摧毁国家或社会内在结构或转型进程的力量。

由此可见，现代政治文明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不应该寄托于源于西方的民主发展的第四波、第五波，而应该寄托于出现各种非西方模式的民主实践。民主生成方式、组织方式以及运行方式的多样性，是现代政治文明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根本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建构实践及其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世人关注和研究。

二、中国现代政治的生成

现代政治文明是人类在寻求自我解放的实践中诞生和形成的。人类寻求自我解放的过程，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之外，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即摧毁既有结构体系并创造全新的结构体系的过程，这就是历史上的革命过程。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民主是在这种革命中诞生的；同样，中国现代政治也是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诞生的。于是，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革命与现代政治之间有了天然的联系。很多人由此认为，中国和西方一样，其现代政治体系都是整个革命的产物。这个判断，也是一半是对的，另一半是错的。中国现代政治确实像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一样，其形成和确立都经历了革命的过程；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是整个革命的直接产物；而中国则不是，准确地讲，中国的现代政治架构是整个国家转型的产物，具体来说，国家转型所需要的政治革命启动了中国现代政治成长，而成长中的中国现代政治则只有在有效推动和

完成了社会革命之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认为，中国现代政治是国家转型的产物，因为国家转型最终是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的。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革命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似乎是为迎接现代文明的诞生而创设，因为，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中，革命本质上是人类为实现自我解放所形成的社会历史运动。阿伦特在其著名的《论革命》一书中就这样写道：“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知道的故事将要展开。十八世纪末两次伟大革命之前，革命这一现代概念并不为人所知。”^①这里所说的“两次伟大革命”，就是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这两次革命都内生于各自的社会与历史，虽然形态与过程不同，但使命共同，就是建立现代社会，创立现代国家。所以，阿伦特认为，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而不是政治领域的结构”，^②而其使命就是使全人类中受奴役者获得解放，从而享受自由与平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认为：“从理论上说，法国大革命意义最为深远的后果，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现代历史概念的诞生。”^③

由此可见，对于人类文明来说，革命所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推翻绝对君主统治，而是围绕着实现人类的自我解放而展开的全面性的社会结构变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发生在1789年至1848年之间的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视为“二元革命”，并将这个时代称为“革命的年代”。他认为：“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

①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② 同上，第14页。

③ 同上，第40页。

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
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
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
“这种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① 中
国的近代革命就是在这样的革命浪潮冲击和裹挟下出现的，它可以属于
近代以来世界革命浪潮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政治在中国的出现
和西方国家一样，都是革命的产物。

革命在行动上体现为用一个新的结构替代既有的旧结构，使革命的
对象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革命在本质上是人实现自我解放的行动实
践，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新旧结构的更换，只不过是革命行动本身应该
包含的内容与任务。由此，创新现代文明的革命应该至少包含三个基本
要件：一是拥有寻求自我解放的主体力量；二是新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获
得有效的成长；其三，产生了促进新旧社会与政治结构彻底替代的历史
行动。用这三个基本要件来衡量中国的近代革命，可以看到中国近代革
命虽然属于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一部分，但革命过程所产生的中国现代
政治，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是整个革命的直接产物，而是整个国家转
型的产物。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中国革命不是爆发于内生的革命主体
力量为实现自我解放而孕育的革命形势与革命行动，而是爆发于古代
的国家与政权在现代化冲击下所深陷的全面危机。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政
治的建构，主要不是从解放现代性的力量出发的，而更多地是从如何使古
老的国家在现代化冲击下得以维持并力图再生出发的，因而，它虽然诞
生于革命过程之中，但其本质不是整个革命的直接产物，即人实现自我
解放的产物，而是实现国家现代转型的产物。

就国家转型来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它必须通过两个革命的有机

^①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页。

统一来完成：即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近代西方所发生的开启现代历史的革命，内生于西方社会的新力量、新观念以及新制度的成长，因而爆发之后就很快形成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相互激荡，即所谓的“二元革命”格局。然而，从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与展开来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浪潮冲击所导致的国家危机而引发的，一方面缺乏足够的内生性，另一方面主要局限于政治革命。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是政治革命在先，社会革命在后。中国的现代政治是在这个逻辑链条中选择、孕育与确立的，既要符合政治革命的规定性，也要符合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要求。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当年在考虑用于建立新社会、新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时候，不是作为中国现代政治的终极形态来设计的，而是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来设计的。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是这样考虑和设计的：^①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677页。